

论原始史料及其传承、整理和调整：从清华简《系年》看先秦史学作品的可信度

尤 锐 (Yuri Pines)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摘要：周代历史文本的可靠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近年来的古文字学革命进一步揭示出史料的复杂性，并为深入探究其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讨论清华简《系年》，并将其信息与相关传世文献，如《春秋》和《左传》等进行比较。本文探讨《系年》的原始史料及其所反映出史料的不同传播方式（书面或口头），以及整理者对文本可靠性的影响。《系年》虽然篇幅较短，但其复杂性警示我们不应对待文本的可靠性采取“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的态度。每段文本都值得被单独对待；应避免笼统的概括；对待传世及新发现的文本，建议采取“敬而疑之”的态度。

关键词：史学；口述；可靠性；《系年》；《左传》

新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相关的诸多研究领域都引发了重大革新，尤其是在史学史领域，更是具有翻天覆地的革命性意义。新出土及已刊布的文献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一些古代的史实，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先秦史学作品的多元性，注意到不同作品不仅有不同作者，而且其受众和写作目标也都有所不同，同时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历史信息的来源及历史文献的整理和传承过程。将新资料与传世文献相映证，还可以让我们对史学史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不同作品的可信度，打开新思路。

史学作品的可信度对于先秦史研究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先秦传世文献中，纯历史作品是非常罕见的，实际上只有《左传》基本上像后代的“正史”一样，系统地叙述春秋时代的历史。^①而有关春秋之前和春秋之后的历史阶段，如西周（或更早），以及战国时代，可靠的历史叙事明显有所缺乏。因而，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不得不依靠许多“半史学”作品，如《国语》和《战国策》之类的历史“轶闻体”资料（historical anecdotes）。因而，《史记》中有关春秋以前和春秋以后（主

^① 由于梁启超否认《左传》的可靠性，曾断言称中国“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页）。尽管梁启超的判断值得商榷，但他敏锐地察觉到先秦和汉代以后的史学风格存在着巨大区别，这一点无疑是可以接受的。

要是战国初期)的叙事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①而新出土的文献不但有利于证明《史记》等传世文献中部分叙事的可靠性,同时也对其他叙事提出较大的挑战。例如,西晋时代盗墓者发掘的《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第一章都证明,《史记·周本纪》中所记载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是错误的,实际上“共和”应该是共伯和的简称,这意味着周厉王被推翻以后是共伯和执政而不是所谓的“二相行‘共和’之政”。^②此外,《系年》第二章中对西周灭亡和东周复兴过程的描述与《史记》所记载截然不同,因此引发关注及较大的学术分歧。^③这里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可信度?目前学术界尚未提出共同标准以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在此敬陈管见,以求教方家。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将就史料可信度提出一些概括性的意见;之后再以清华简《系年》为例,系统地讨论其叙事的可信度。之所以选择《系年》,并非偶然。首先,在迄今所刊布的出土史学作品中《系年》是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作品。^④其次,《系年》大半章节与《左传》的叙事具有密切的关系,基本上记述了同样的时代和同样的事件,这让我们能够进行系统的比较。最后,尽管《系年》应该是楚国史官的作品,但其原始资料是多元的,既有西周、春秋、战国初叶(约前1046—前395年)的记录,也包括晋国和楚国史料(可能还有西周时代的原始资料,但篇幅所限,不在此进行讨论)。^⑤《系年》资料来源的多元性,有助于我们对影响史料可信度的诸多因素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① 在讨论战国时代的历史时,司马迁主要依赖的是“秦记”(其缺点也由太史公在《六国年表》中提出);其他的可靠资料则是零散的,因而《史记》中许多有关战国时代的信息仍然基于当时轶闻体资料(参见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有关《史记》对西周及战国初叶的叙事的不足,可见拙作, *Zhou History Unearthed: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2020年),第95-121页。

② 李学勤先生早已注意到《系年》第一章和《竹书纪年》可以互相印证,详见其《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71页。有关“共和”(共伯和)的相关学术分歧,详见佐藤信弥(Satō Shinya),《歴史評価としての共伯和》,《中国古代史论丛》第9集(2017年),第1-30页;并见拙作 *Zhou History Unearthed*,第97-100页。

③ 有关《系年》第二章及其与《史记》叙事的关系,许多国内外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如王晖、朱凤瀚、徐少华、李零、沈载勋(Shim Jae-hoon)、吉本道雅(Yoshimoto Michimasa)等,详见Chen Minzhen 陈民镇 and Yuri Pines, “Where is King Ping?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Zhou Dynasty’s Eastward Relocation.”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31.1 (2018): 1-27 及其脚注。

④ 《系年》以外还有两篇尚未出版的出土历史文献,一篇属于安徽大学所藏的战国竹简(见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第58-59页),另一篇则是龙会河北岸第324号墓地所出土楚简中的楚国历史书。在《系年》刊布以前,在出土文献中没有系统的史学作品,只有许多“半史学”文献,参见 *Zhou History Unearthed*,第254页脚注10;更详细的讨论可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60-280页;以及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8-114页。在更早期的出土文献中,史学作品占主流,如汲冢竹书。可惜的是,大部分汲冢资料已久不流传,失传已久,而且其原始面貌也早就被整理者改变了。详见Edward L. Shaughnessy (夏含夷),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年),第131-256页。

⑤ 有关《系年》的性质、写作年代和地点及其原始资料,详参拙作 *Zhou History Unearthed* 及其脚注。

一、关于先秦史料可信度的概述

历史学并不是自然科学，没有百分百可信的叙事，甚至连所谓的“实录”也都是基于史学家（史官）的选择，对哪一项史实进行报告、对哪些则予以忽视。然而，不同史料明显具有不同的可信度；一些叙事基本上反映史实，而其他的则有较多的虚构成分，乃至全部都是虚构的。而且，有些史料尽管不算是虚构的，但出于各种原因并不与史实完全相符。

那么先秦史料为什么会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呢？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因素值得关注，即历史作品的资料来源、写作目的，及其传承和整理过程。我将从后者开始讨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的先秦传世文献都不是个人作品而是作者（们）和整理者（们）的共同产物。这些文献大多是到了西汉末（甚至更晚）才有定本；甚至从文字角度也可以清楚看出汉代整理的痕迹。^①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许多文献都经过反复调整，其中既包括对内容的意外改动（如错简、错字、旧注进入原文等），也包括故意的“修整”。整理者会调整一些细节，甚至删除那些不符合自己立场的内容并窜入新的内容。正如许多学者早已指出的，《左传》中的部分资料是战国末叶及西汉（甚至更晚）的整理者窜入或调整过的，恐怕其他文献也不能例外。^②相比较而言，出土文献的整理过程较短，但也无法完全避免传承者和整理者对原始资料进行调整，在《系年》中就存在着这类调整痕迹（详见下文）。

第二是作者（编纂者）的写作目的会影响其作品的可信度。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有意要满足或者影响其读者。关于写作目的对作品可信度的影响，笔者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建议把先秦历史与半历史的作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信息类”的历史（informative histories），第二类则是“解释类”或“教训类”的历史（interpretative of didactic histories）。^③前者基于史官的实

① 例如，绝大多数先秦传世文献中只使用“国”字，而“邦”字则非常罕见（如在《左传》中“邦”字仅出现一次），这应该是西汉时期为避讳刘邦之名而进行了修改[见吉本道雅（Yoshimoto Michimasa），《国语小考》，《东洋史研究》1989年，第48卷，第3号，第443页]。而在出土文献中“邦”字频繁出现，而“国”字则相对罕见。

② 二十世纪的学者在讨论《左传》写作年代时常常指出后人窜入了许多内容，有关学术分歧也比较大。许多著名学者，如顾颉刚、张汉东、赵光贤、胡念贻、王和等，都提出过宝贵意见。笔者也曾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参见拙作，*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第221-226页和第233-246页及相关脚注]。近年来，徐建委在其《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81-246页，乔治忠在其《〈左传〉〈国语〉被刘歆窜乱的一项铁证——历史年代学刘坦之说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三期，第68-78页）中，都提到西汉末叶刘歆如何调整《左传》的内容。

③ 见拙作“Zuozhuan Source Materials in Light of New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in: *Zuozhu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d. Yuri Pines, Martin Kern, and Nino Luraghi（Leiden: Brill, 2023），第23-29页。

时记载，其重点是 who, when, where, and what（谁，何时，何地，做了什么）等问题，而 why（为什么）的问题，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几乎不被讨论。笔者认为，信息类历史与中国早期史官制度起源具有密切关系，在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都可以看到“信息类”历史的痕迹，如西周铭文所记载册命仪式、部分战役叙事等，都具有浓厚的信息类历史的特点。^①鲁国的《春秋》在本质上属于信息类历史，尽管其并非纯粹的“实录”[其记录常常反映出所谓“礼仪现实”（ritual reality），即基于周礼制等级而非真正的权力平衡；此外，作者们“避讳”的风格也致使其对一些史实进行掩盖]，但从根本上看，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②

与“信息类”历史相反，“解释类”的作品则聚焦于“为什么”的问题，要解释成败、兴衰的原因，让读者“以史为鉴”，意在教会读者通过理解历史吸取教训。《左传》是“解释类”历史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各种方式，如贤人的言论、预言、“君子曰”评价等，教导读者如何“读懂征兆”、“观察和预测”未来事件，如何了解历史过程中的主要因素等。^③同时，《左传》也具有极为丰富的“信息类”历史成分。实际上，在先秦历史文献中，只有《左传》很好地维持了信息类和解释类成分的平衡，前者是《左传》叙事的骨架，后者则是其血肉。^④与此相反，战国时代绝大多数的历史和“半历史”作品只重视历史解释，把一些“不必要的细节”予以删除^⑤，常常忽略或者调整一些史实，以便让读者更容易吸取历史教训。例如《国语》这部著作，其原始资料很可能与《左传》相同，即列国的“国史”（详见下文），但其编纂者只重视贤人的言论及其所提出的历史教训，而“信息类”成分则微不足道。到了《战国策》和诸子百家作品中的历史轶闻，其可信度就更低了；为了便于传达教训类信息，这些文献有时甚至会完全摒弃对历史事件的准确

① 例如，《晋侯稣编钟》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信息类历史记载，详见 Shim Jae-hoon, “The ‘Jinhou Su bianzhong’ Inscrip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Early China* 22 (1997): 43-75。

② 有关《春秋》经的可信度及其局限性，参见拙作 *Zhou History Unearthed*，第 17-23 页；并参见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修订本）第 7-18 页以及 Newell Ann Van Auken, *Spring and Autumn Historiography: Form and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ese Ann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关于“礼仪现实”的概念，参见 Joachim Gentz (耿幽静), “The Past as a Messianic Vision: Historical Thought and Strategies of Sacralization in the Early Gongyang Tradition,” in: *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Helwig Schmidt-Glintzer, Achim Mittag and Jörn Rüsen (Leiden: Brill, 2005), 第 227-254 页。

③ 参见 David Schaberg (史嘉柏),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2001); Li Wai-yee, *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2007)。

④ 有关信息类历史在《左传》叙事中的重要性，见拙作 “Zuozhuan Source Materials,” 第 29-38 页；以及 Stephen Durrant (杜润德), “The Problem of ‘Other Annals’ Embedded in Zuozhuan,” in *Zuozhu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第 89-124 页。

⑤ 关于“不必要的细节”概念，见 Li Wai-yee (李惠仪), “Inconvenient and Unnecessary Details in Zuozhuan,” in *Zuozhu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第 125-152 页。

描述，甚至创造纯属虚构的故事（如尧舜禅位等传说）。出土文献中也有不少与史实不相符的轶闻以及基本上纯属虚构的作品。^①

与许多新出土的“半历史”作品不同，《系年》没有浓厚的教训类色彩，其内容跟信息类作品是比较相近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也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某些条件下也会操纵历史叙事（详见下文第四节）。

在研究历史作品可信度时，学者们常常聚焦于上面两个因素，但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讨论的是第三个因素，即原始资料的问题。对于任何历史作品，原始资料的可信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可靠的史料，任何学者都无法对过去事件进行可信的描述，古今中外都一样。例如上文中我提出的《史记》在西周和战国初期叙事中存在一些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缺乏史学学术操守，而是因为缺乏可靠的资料。那么，在讨论先秦史时，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当时史料的特征及其传承方式（如口述和写在简帛上的传承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详见下文）。在这里，笔者将通过对《系年》的分析，解读春秋时代史料及其传承方式的多元性，以及其对《系年》叙事的可信度产生的影响，希望该讨论有助于深化对先秦史料可信度问题的研究。

二、《系年》中的晋国史料：晋国国史

在讨论《左传》原始资料的来源时，许多古代学者，如杜预（222—285）、刘知几（661—721）、啖助（724—770）、顾炎武（1613—1682）等，都提出该资料应该来自列国的“国史”（别称列国“史记”）^②。不过，前辈学者难以确认这些“国史”

① 有关历史轶闻（historical anecdotes）及其在战国时代的普遍性及在思想史上的作用，参见 David Schaberg,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I: *Beginnings to AD 600*, ed.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第 394-414 页) 以及 Paul van Els and Sarah Queen, eds., *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 Rhetorical Uses of 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有关《战国策》的轶闻如何背离事实，见 David Schaberg, “On Quoted Speech in Anecdotal History: Zhanguo as Foil to Zuozhuan,” in *Zuozhu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第 209-243 页。有关禅让故事的虚构特征，参见拙作，“Disputers of Abdication: Zhanguo Egalitarianism and the Sovereign’s Power,” *T’oung Pao* 91.4-5 (2005), 第 243-300 页，及 Sarah Allan (艾兰), *The Heir and the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 (rev. e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有关出土文献中的教训类故事及其可信度的有限性，参见拙作《教训类叙事与自强之道——读清华简〈越公其事〉》，《出土文献》2023 年第 4 期，第 124-144 页。有关出土文献中的虚构故事，如上博简《容成氏》中所云，参见拙作“Political Mythology and Dynastic Legitimacy in the *Rong Cheng shi* Manuscrip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3.3 (2010), 第 503-529 页。

② 刘知几将“国史”与“史记”名称交替使用，见《史通通释》（浦起龙注；台北：里仁书局，1993 年）卷 14，第 408 和 420 页；并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载于《春秋左传正义》卷 1，第 1705 页）；啖助（被陆淳引用，见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四库全书电子版本，卷 1，第 5 页）；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如成注；长沙：岳麓书社，1996 年），卷 4，第 112 页。

的性质。而最近，在《系年》刊布以后，我们能够通过与《左传》的比较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系年》大部分资料来自两个国家的“国史”，即晋国与楚国（除前四章外，其他章节中都使用了这两国的纪年方式）。首先来看《系年》中使用的晋国资料。《系年》一共有八章都采用了晋国的纪年方式（第6—10、14、17、20章）；此外第18章同时采用了楚和晋的纪年，可能是因为同时使用了两国的资料。而关于晋国的这八章的内容（除第20章后半部分外）与《左传》是非常相近的。在下文，我将对其中最长的章节（第6章）进行分析，通过将其与《左传》进行比较来讨论其原始资料和传承方式。表1将《系年》第6章分为9个小节，并将每节内容分别与《左传》中的记述做简略比较。

表1 《系年》第6章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较

序号	《系年》	《左传》 ^① 及笔者注
1	晋献公之嬖妾曰骊姬，欲其子奚齐之为君也，乃谗太子共君而杀之，或（又）谗【31】惠公及文公，文公奔翟（狄），惠公奔于梁。	庄28.2和僖4.6。据《左传》，公子夷吾（惠公）及公子重耳（文公）先逃到晋之要塞蒲和屈，之后才逃到狄、梁（僖5.2、6.1）。
2	献公卒，乃立奚齐。其大夫里克乃杀奚齐，【32】而立其弟悼子，里克又杀悼子。	僖9.4。《系年》中这句话有误，“而立其弟悼子”的主体应该是骊姬，并不是里克。
3	秦穆公乃内（纳）惠公于晋，惠公赂秦公曰：“我【33】句（苟）果内（入），使君涉河，至于梁城。”惠公既内（入），乃背秦公弗予。	僖9.6+15.4a。
4	立六年，秦公率师与【34】惠公战于韩，捷惠公以归。	僖15.4。
5	惠公焉以其子怀公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其子妻之。	僖17.2。《系年》省略了惠公回国的故事（僖15.8）。
6	文公十又二年居翟（狄），翟（狄）甚善之，而弗能内（入）；乃适齐，齐人善之；适宋，宋人善之，亦莫【36】之能内（入）；乃适卫，卫人弗善；适郑，郑人弗善；乃适楚。	公子重耳出亡的故事：僖23.6。《左传》中记述重耳所走的路线基于其先后到了什么国家（狄、卫、齐、曹、宋、郑、楚、秦；《国语·晋语1》与此大同小异），而《系年》则是按每个国君对待重耳的不同态度进行的排序。值得注意的是，《系年》省略了曹国，也没有提及楚国是如何对待重耳的。

① 文中所引《左传》，其中鲁公执政的年份所加的条号是按照 Stephen Durrant, Li Wai-ye, and David Schaberg 译, *Zuo Tradition / Zuozhuan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该译本的条号是基于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

续表

序号	《系年》	《左传》及笔者注
7	怀公自秦逃归，秦穆公乃召【37】文公于楚，使袭怀公之室。	僖 22.5；然而在《左传》中，怀公“逃归”与秦穆公支持重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8	晋惠公卒，怀公即位。秦人起师以内（纳）文公于晋。晋人杀【38】怀公而立文公。	惠公卒：僖 23.4；重耳回国：僖 24.1。据《左传》，重耳亲自派人杀怀公。
9	秦晋焉始会（合）好，戮力同心。二邦伐郛，徙之中城，围商密，捷【39】申公子仪以归。【40】	僖 25.3。

《系年》第六章讨论的是晋国历史上最不平静的 25 年（前 660—前 635 年），其间发生了骊姬之乱、晋惠公执政与韩之战，以及公子重耳（晋文公）出亡、回国、走向霸业等。在《左传》中这部分故事长达 7 千字，包括信息类、解释类和教训类的资料，并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①与之相反，《系年》第六章只有 400 多字，因而许多细节被省略，比如既孝且顺的公子申生（太子共君）的悲剧、骊姬的诡计，以及晋国大臣的艰难选择——要忠于国君个人还是忠于“社稷”（即国家的长远利益）等^②。对《系年》编纂者来说，晋国内部事务及其潜在的历史教训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介绍晋国崛起的过程，及其如何成为楚国的主要对手。

尽管《系年》省略了许多细节，但其叙事的事实骨架与《左传》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系年》省略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细节，即楚王如何对待重耳（晋文公）以及重耳如何帮助周襄王复辟。前者是个很重要的故事：据《左传》，楚成王厚待重耳，重耳感谢他说：“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左传·僖 23.6e》）。此后，楚令尹子玉请杀重耳而成王不肯。这个故事对于理解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及了解城濮之战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系年》中对此并无记述。这种缄默是否基于楚国的某种政治敏感尚有待考证。而省略晋文公与周襄王复辟这一故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跟晋、楚之间的关系无关，因而在《系年》第六章最后一节中涉及了晋、秦的联盟及其与楚国的冲突，却忽略了晋文公与周王的关系。

由于《系年》与《左传》的叙事相近，部分读者可能会认为《系年》是《左传》的缩写版，但其实并不一定。无论是从年代跨度或纪年方式看，《系年》都有别于《左传》，也就是说《左传》不太可能是《系年》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这两个文本具有相似性，也许是因为其编纂者使用了共同的原始资料（在上文这个例子中是晋国的“国史”），都用了“剪切、粘贴”（cut and paste）方式，不过《系年》省略了更多资料，而《左传》可能跟原来的国史更为相近（或添加了部分信息）。此

① 详见拙作，“Zuozhuan Source Materials”，第 32-36 页。
② 详见拙作，*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第 150-152 页。

外，应该注意到《系年》编纂者的一个缺陷。上述第二节中这句话——“献公卒，乃立奚齐。其大夫里克乃杀奚齐，【32】而立其弟悼子，里克又杀悼子”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因为“而立其弟悼子”的主体应该是骊姬，而不是里克。这个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笔者认为，在“剪切和粘贴”的过程中，楚国史官犯了错误，但由于他认为所有的读者都应该知道“立悼子”的人是骊姬，而不是里克，因此并没有修改这一错误。类似的在省略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甚至在《史记》引用《左传》时都发生过^①，在《系年》中出现也是正常的。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在使用晋国“国史”的时候，《系年》的编纂者依赖的是写在简帛上的版本。实际上，不仅是第六章，《系年》中所有有关晋国的章节，以事实所建构的骨架来说，与《左传》是基本一致的，这也说明两部书的编纂者都利用了写在简帛上的晋国史。然而，在与楚国相关的章节中，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三、《系年》中的楚国史料：楚国国史与口述传承

《系年》应该是楚国的作品。它不但主要使用楚文字，而且其中关于楚国的章节是最多的，篇幅也最长。此外，《系年》最后几章——甚至在与楚国历史无关的第22章——都采用了楚国的纪年方式，这也意味着编纂者应该是楚国人。在总共23章中，10章采用了楚国的纪年方式（第5、11—13、15—16、19、21—23章），在第18章中并用了楚国和晋国的纪年，这些章节都应该是基于楚国的“国史”。而除断代于战国初叶的最后三章外，其他采用楚国纪年方式的章节都跟《左传》内容相近。然而，这种相近与晋国资料跟《左传》的相近又有所不同。为突出这一点，我首先将对楚国资料中的最长的章节之一，即第15章进行分析。

表2 《系年》第15章与《左传》比较

序号	《系年》	《左传》及笔者注
1	楚庄王立，吴人服于楚。【74】	《左传》没有相关的记载，除了《左传·宣8.3》（楚庄王13年）：楚初“盟吴、越”。
2	陈公子征舒取妻于郑穆公，是少盂。【74】	（宣9.6+10.4）：征舒不是公子（可能是公孙），他是不是少盂（夏姬）的丈夫，在《左传》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几乎所有的解释者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征舒是夏姬的儿子。
3	庄王立十又五年，【74】陈公子征舒杀其君灵公，庄王率师围陈。	（宣10.4+11.5）：围陈应该发生在楚庄王第16年。

^① 例见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倪豪士), “For Want of a Hand: A Note on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Jin’ and Sima Qian’s ‘Chunqi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7.3 (2007): 229-247, 特别是第241-246页。

续表

序号	《系年》	《左传》及笔者注
4	王命申公屈巫适秦求师，得师以【75】来。	《左传》无。
5	王入陈，杀征舒，取其室以予申公。连尹襄老与之争，掎（夺）之少氂。连尹骖（捷）于河【76】滩，其子黑要也或（又）室少氂。	（宣 11.5+成 2.6）：大同小异。
6	庄王即世，共王即位。黑要也死，司马子反与申【77】公争少氂，申公曰：“是余受妻也。”取以为妻。司马不顺申公。王命申公聘于齐，申【78】公窃载少氂以行，自齐遂逃适晋，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教吴人反楚。【79】	（成公 2.6+7.5）：《左传》所记更为详细，并记载了司马子反杀掉申公家族之事。此事成为申公“通吴晋之路”的主要原因（《国语·楚语上 4》记载与《系年》相近）。
7	以至灵王，灵王伐吴，为南怀（淮？）之行，执吴王子蹇由，吴人焉或（又）服于楚。	（昭 5.8）有：“楚无功而还，以蹇由归”；但其所称“吴人焉又服于楚”是不准确的，因为“南淮之行”以后，楚吴仍争战不休。
8	灵王即世，【80】景平王即位。少师无极谗连尹奢而杀之，其子伍员与伍之鸡逃归吴。	（昭 19.2+20.2）：《左传》更详细地记载了伍员（即伍子胥）的故事，但伍子胥的哥哥伍尚被楚王而杀，并没有另外的兄弟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到吴。在其他文献中也没有“伍之鸡”其人。
9	伍鸡将【81】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涇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涇。	《春秋·昭 23.7》+《左传·昭 23.5》都提到鸡父之役，但没有提到伍鸡其人。
10	景平王即世，昭王即【82】位。伍员为吴太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	（《左传·昭 30.4》以及昭 31.4+定 4.3）记载“伍员谋楚”的过程及柏举之战、吴人入郢。据《左传》伍员担任了吴国的“行人”；但是否当过太宰则待考。
11	昭王归【83】随，与吴人战于析（沂）。	（定 4.3+5.5）；但在沂之战并非昭王亲自率兵而是楚、秦联合作战（另见《系年》第 19 章）。
12	吴王子晨将起祸于吴，吴王阖庐乃归，昭王焉复邦。【84】	（定 5.5）。据《左传》，吴国撤兵的原因除了王子晨乱以外，还有“越入吴”（《左传·定 5.3》）以及吴国被楚、秦联军打败。

《系年》第 15 章总结了约一个世纪（即前 599—前 505 年）楚吴关系的起起落落。要把这个长远且极为复杂的历史浓缩在 400 多个字中，肯定要有取舍；例如，许多在《左传》中被详述的细节（如干支纪日、地名、人名、官名等）都被省略了。尽管如此，像前文第 6 章一样，《系年》第 15 章仍然保持了与《左传》相近的事实框架。

《系年》第15章具有信息类历史的表征，但也包括了一些解释性的内容。该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节1—6）聚焦于申公巫臣（屈巫）的故事；第二部分（节7—12）则专注于伍员（伍子胥）的故事。屈巫和伍子胥都是楚国的贤臣，然而由于内部斗争或诽谤，不得不离开故国并成为敌人。二者先后到了楚国的对手——吴国，并把它变成楚国的死敌。这种将吴国的崛起归于楚国内政问题造成的不幸后果，反映的应该是楚国独特的历史视角。然而，这个论辩并非《系年》第15章的主要内容。解释性色彩在其叙事中只承担着次要角色，因而其叙事省略了跟屈巫、伍子胥有关的戏剧性细节，如屈巫的家族被楚人杀灭、楚平王要召回伍子胥，保证“来，吾免而父”，但伍子胥仍然出逃，其父亲与其哥哥因此被杀等^①。类似细节无疑会提高故事的文学性及教训价值，但《系年》编纂者却将它们简略掉，意味着其叙事的主要目的并非解释历史或教育读者，而只是简要地介绍楚吴关系的变化过程。

与第6章相比，《系年》第15章与《左传》的叙事明显有更多不同之处。有些细节是无关紧要的，如陈国夏征舒的身份（第2节：《系年》称其为公子，而实际上征舒是陈宣公的曾孙）及伍子胥是否为吴国的太宰（第10节）等。^②此外，《系年》中以夏姬为征舒的妻子（第2节），而《左传》尽管没有直接记载夏姬和夏征舒之间的关系，但许多注释家（及《国语·楚语》第4章的作者）都认为夏姬是征舒的母亲。如果她真是征舒的母亲，那在楚国大臣因她而争斗时，夏姬应该已经年约50。这个年龄的女人仍能保持其“蛇蝎美人”的吸引力是颇令人难以置信的，正如汉代刘向所质疑：“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列女传·孽嬖》）。^③因而，有学者早前指出，在这一点上，《系年》好像比其他文献更接近史实。^④此外，《系年》与《左传》不同之处，还表现在第1节、第7节的记载本来是吴国“服于楚”“又服于楚”，这可能反映了楚国的历史视角，尽管与《左传》有所不同，但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然而，我们要特别注意《系年》第15章中的有些细节是《左传》所未涉及的。如第4节中的“王命申公屈巫适秦求师，得师以来”。笔者认为这个记载不太可靠，首先，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楚庄王侵略陈国的时候用了“讨夏征舒”的借口，因而其征伐并没有引起其他诸侯的对抗，完全不需要向秦“求师”；其次，秦离陈较远，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不太可能派兵支持楚军。笔者认为《系年》第15章中记述的屈巫赴秦的使命与前506年楚大夫申包胥的使命被混淆了。在吴国入郢以

① 分别参见《左传·成公7.5a》和《左传·昭公20.2b》。

② 有关伍员在吴国的职位，详见刘光，《清华简〈系年〉所见伍子胥职官考》，《管子学刊》2017年第3期，第112-118页。

③ 后人认为夏姬通过房中术来恢复青春活力；详见 *The Zuo Tradition*，第726页，第84脚注。

④ 参见魏慈德，《〈清华简·系年〉与〈左传〉中的楚史异同》，《东华汉学》17号（2013年），第25页；张崇依，《从〈春秋左氏传〉看清华简〈系年〉所用史料——以夏姬史事为例》，《殷都学刊》2017年第2期，第54-58页。

后，申包胥确实到过秦，向秦公求师以助楚王抵抗吴国侵略者（《左传·定 4.3f》）。《系年》编纂者把申包胥的姓氏“申”与屈巫的爵位“申公”搞混了，因而发生了这个错误。

与此相同，第 8—9 节所记伍之鸡（伍鸡）的故事应该也是虚构的。按照《系年》，除伍子胥以外，伍奢还有另一个儿子名叫伍鸡，他也出逃到吴并任吴国将军。网友子居早已指出，伍鸡很可能只是由于“鸡父”这一地名（即吴军在前 519 年打败楚军的地点，《春秋经》和《左传》都有记载）而被衍生出来的虚构人物。^①这个杜撰出来的人物很可能是楚人口头传说的产物，也许在楚国国史的某一个传承阶段这个人物被添加了进去，也可能是《系年》的编纂者自己增加了这个细节（笔者认为前者更为可信）。无论如何，上述两个例子都证明，除了利用比较可靠的楚国史书外，《系年》在讨论楚国历史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些口传的故事。

除第 15 章以外，《系年》中许多其他有关楚国的章节也包含着与《左传》不同的细节，其中部分应该是《系年》编纂者的粗心造成的。例如，第 11 章把宋国右师华元与其父亲华御事混为一谈，同时还把楚国大臣申公叔侯与另一大臣申舟混淆了；第 16 章则把前 579 年楚国与晋国的盟誓与前 546 年“弭兵之盟”的盟誓混同了（详见下一节），第 19 章又把楚国灭陈与灭蔡的年代混淆了，等等。^②然而，《系年》中一些有关楚国的章节也含有比《左传》更可靠或更详细的信息，如上述夏姬为征舒的妻子而不是其母亲，又如第 12 章中所记“楚庄王立十又四年，王会诸侯于厉，郑成公自厉逃归”——这句话解释了《左传》注释者所无法理解的“楚子为厉之役故，伐郑”的记载（宣 9.7）。^③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系年》第 18 章后四枚竹简对楚昭王时期楚、晋、吴的关系的记载，比在《左传》中更详细，且更准确，能够弥补《左传》叙事中的一些不足。^④总结而言，《系年》的编纂者肯定引用了楚国的历史书（即楚国的“国史”），并非只依靠口述传承的故事。然而，上述的错误或者部分虚构的细节应该都与口述传承资料有关。那么，为什么在《系年》的楚国资料中有许多口述传承的痕迹，而晋国资料中则几乎没有呢？

笔者认为，《系年》的楚国相关章节中这些漫不经心的记录恰恰反映出作者（编纂者）是楚国史官。我们都认识到，如果要讨论自己并不熟悉的历史，肯定要先看

① 子居，《清华简〈系年〉12~15 章解析》，<http://xianqinshi.blogspot.com/2017/09/1215.html>。

② 这些例子都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卷》的整理者讨论过，又参见苏建州、吴雯雯和赖怡璇编，《清华二〈系年〉集解》（台北：万卷楼，2013 年）以及拙作，*Zhou History Unearthed*。此外，参见熊贤品，《简牍文献商周史事记载的改编与讹误》，《西部史学》第 8 辑，第 26-29 页。

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厉之会的时候，郑国的统治者是襄公而不是成公；《系年》仍然具有讹误。

④ 《系年》第 18 章记载：“晋与吴合为一，以伐楚，门方城，遂盟诸侯于召陵。”《春秋·定 4.2》也记载“公会……于召陵，侵楚”，而据《左传·定 4.1a》的叙事，“会于召陵”的时候，晋国不愿意伐楚，因而“失诸侯”。由于《系年》与《春秋经》相近，笔者认为《左传》有误，而《系年》则更接近史实。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定、哀部分的叙述不如襄、昭年代的内容丰富，并有一些讹误。《左传》定、哀部分叙事的风格及其与之前的叙事有所不同的原因值得另行讨论。

相关的历史书。与此相反，在讨论自己非常熟悉的题目时，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记忆。而记忆，可惜，常常会有错误。楚国史官在讨论晋国历史的时候利用了相关的史书（即晋国国史），而在讨论故国历史时则不需要不断地查阅历史文献，许多细节可能都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再现的。也就是说，史官越熟悉故国的历史，其叙述可能在某些细节方面就越不可靠。然而值得提醒的是，从总体而言，《系年》的叙事是可信的；无论其中有多少讹误，起码其根本的叙事应该是与事实相符的。

四、操纵历史：《系年》中的楚国立场

笔者在上文多次指出，《系年》在根本上属于信息类的历史，起码其中教训类的叙述是极简的。然而，《系年》并不是纯粹的“实录”。正如《春秋》经一样，它遵循“避讳”规则，特别是关于楚国内乱、弑君等情况，从来没有直率地进行记录。^①此外，其编纂者也会对历史记录进行些微篡改，给楚国的外交政策营造出更良好的印象。在这个方面，第16章具有特殊的地位。

楚共王立七年，令尹子重伐郑，为沔（泛？）之师。晋景公会诸侯以救郑，郑人戡（捷）郕公仪，献【85】诸景公，景公以归。一年，景公欲与楚人为好，乃脱郕公，使归求成，共王使郕公聘于【86】晋，且许成。景公使余之蔑聘于楚，且修成，未还，景公卒，厉公即位。共王使王【87】子辰聘于晋，又修成，王又使宋右师华孙元行晋楚之成。明岁，楚王子罢会晋文【88】子燮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明岁，厉公先起兵，率师会诸侯以伐【89】秦，至于泾。共王亦率师围郑，厉公救郑，败楚师于鄢。厉公亦见祸以死，亡（无）后。【90】

这一叙事的重点是楚国与晋国如何首次尝试建立持久和平关系及这一尝试失败的原因。故事的第一部分（第85—89简）讨论的是双方谈判过程，与《左传》中的记述大同小异，这里不再赘述。^②这部分唯一值得注意的不同细节是前579年“盟于宋”的参加者及盟誓的内容。据《左传·成公12.2》“盟于宋”的并不是“诸侯之大夫”，而只有晋国、楚国以及楚国附庸——许国的大夫，而盟誓的内容则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云云。与此相反，《系年》中所记为：“楚王子罢会晋文子燮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弭天下之甲兵。’”这一差别可能是由于《系年》编纂者

① 无论楚国国王是被杀还是自然地去世，《系年》一直记载某王“即世”；只有一次记载楚灵王“见祸”（《系年》第18章）。而对其他的统治者则没有类似的“避讳”记录。

② 有关一些不同的细节，详见拙作，*Zhou History Unearthed*，第206-209页。

混淆了前 579 年宋之盟与前 546 年“弭兵之盟”（同样的“盟于宋”）的参加者及盟誓内容^①，但也可能是编纂者故意调整了盟誓，以便谴责是晋国违背了盟约。

盟约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左传》坚持认为是楚国背信弃义：盟约签订后不久，楚国司马子反就警告来访的晋国大臣郤至，如果两国国君见面，“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左传·成公 12.4》）；也是说，势在必战。公元前 578 年晋国对秦国的攻击与晋楚和平协议无关，只是在报复秦国的反晋阴谋。公元前 576 年，楚国攻击郑国，则违反了楚与晋的盟约；《左传》中多次引用楚国和晋国贤臣的言论，指责楚国统治者违反了和平协议，如引用司马子反所主张：“敌利则进，何盟之有？”因而楚国贤人申叔时警告，“子反必不免”（《左传·成公 15.3》）。据《左传》，是楚国的无信及其见利忘义的态度导致了公元前 575 年鄢陵之战的灾难性后果（对楚国而言）。直到鄢陵之战，《左传》才开始对晋国采取更为严厉的批评态度，称晋国的胜利是亡羊补牢式的，很快就会导致国内动乱。

《系年》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则大相径庭。晋国对秦国的攻击被视作违反了“弭天下之甲兵”的盟誓，因而楚国对郑国的攻击则像是一种报复措施。此外，《系年》的编纂者在叙述中还做了手脚：摈弃公元前 578 年之后的准确年代顺序，把跨度超过五年的所有事件（楚国攻郑、晋国报复、鄢陵之战和晋厉公被推翻）都说成是在晋国反秦的直接影响下相继发生的。这种压缩造成了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如在鄢陵之战前夕郑国不是楚国的受害者，而是楚国的盟友^②，而《系年》认为“厉公……败楚师于鄢”是因为要“救郑”。此外，《系年》的叙事旨在引导读者得出结论：晋厉公在鄢陵之战一年后被弑，可视为上天对其背信弃义的报复。在《系年》叙事中，楚国是受害者；这与《左传》是正好相反的。表 3 总结了这两种叙述的异同。

表 3 《系年》第 16 章与《左传》比较

《左传》	《系年》
前 582 年以后楚、晋求和	前 582 年以后楚、晋求和
前 579 年宋之盟：两国誓言互不侵犯	前 579 宋之盟：所有的诸侯誓言“弭天下之甲兵”
楚国暗示将背信弃义，准备再次攻击晋国及其盟友	—
前 578 年：晋国攻击秦国（与楚无关）	前 578：晋国攻击秦国因而违犯宋之盟的誓言
前 576 年：楚攻击晋国的盟友郑	楚攻击郑为了使晋放弃对秦的攻击
前 575 年：郑与楚联盟，晋国攻击郑和楚，并在鄢陵将它们击败	晋救郑，在鄢陵击败楚军
前 574 年/前 573 年晋国内乱	晋国内乱：是否是上天的惩罚？

① 前 546 和前 541 年的“弭兵之盟”记载于《系年》第 18 章。又参见河野收（Kōno Osamu），《中国古代の或る非武装平和运动——向戌の弭兵战略とその批判》，《军事史学》第 13 辑（1978 年），第 64-74 页。

② 《春秋经·成公 16.6》也明显地记载“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

《系年》第16章是唯一明显带有亲楚倾向的章节（值得注意的是，第18章将前546年“弭兵之盟”协议的破裂完全归咎于楚灵王）。有趣的是，《左传》对公元前579年盟约之后事件的描述，同样也表现出强烈的亲晋和反楚倾向。也许，通过这些倾向，我们可以窥见两国精英的不同观点。谁应该为违反盟约承担责任，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晋国和楚国的史书反映出了这种敏感性。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生活中，获得道德制高点的重要性不亚于今天；而为了切合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调整历史叙述，更是古今中外的共同现象。

五、结 论

《系年》在先秦史学中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笔者认为，这篇文献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体裁，即为统治者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其写作的主要目的似乎在于让楚国的统治者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天下大势”，向他们介绍国际关系和局势的要点，以及楚国与其对手之间关系的变迁。与大多数同时代历史作品相比，《系年》较少关注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或娱乐读者。因而，从根本上它具有着浓厚的“信息类”历史的色彩。^①

通过《左传》与《系年》的相关比较，我们可以推断出二者都利用了共同的第三方资料，即列国的国史。这些国史应该是基于各国史官的实时记录，但也包括了教训类和娱乐类的成分，以及基于口头传说的资料。后一种资料在《左传》中更为明显，但在《系年》中也能看到它的痕迹。尽管类似资料的可信度不大，但仍要注意到：《左传》和《系年》这两篇文献中的历史叙事是非常相近的。这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本书基本上是可靠的，起码在讨论“天下大势”的时候，两篇文献的编纂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事实。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两篇文献中也包括了许多不可靠的细节。我在上文提出，弱化《系年》可信度的因素主要可以归于三方面。第一，编纂者依赖口述材料或自己个人的记忆因而弄乱了一些历史细节。第二，其原始资料，尤其是楚国的国史可能已经吸收了部分口述传承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应该是虚构的。第三，在一些章节中（如上述第16章），编纂者故意调整了叙述内容以使其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类似弱化可信度的因素不但在《系年》中出现，在《左传》及其他出土和传世文献中也都不例外；甚至在基本上可靠的资料中也会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在研究先秦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各种史料具有的不同可信度。

上文所讨论的一些例子让我们能够重新考虑先秦史料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我们必须走出“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的态度，必须认识到每一篇文献、每一章

^① 详见拙作，*Zhou History Unearthed*，第65-67页。

节，甚至每一句话都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可信度。那么，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同时，要避免纠枉过正地进入“信古时代”；对传世和出土文献都保持古犹太贤人所主张的“כבדהו וחשדהו”（敬而疑之）的态度。

On Transmission, Editing, and Modification of Primary Sources: Discussing Reliability of Preimperial Historical Texts on the Basis of *Xinian* 系年 Example

Yuri Pines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reliability of historical texts that deal with the Zhou era have long been at the focus of scholarly debates. Paleographic revolution of recent decades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immense complexity of our sources. My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manuscript *Xinian* 系年 (Linked years), the information of which I compare to relevant transmitted texts, such as *Chunqiu* 春秋 *Annals* and *Zuo Tradition* (*Zuozhuan* 左传). The article examines *Xinian*'s primary sources, the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miss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therein (written or oral), and the editors' impact on the text's accuracy. The complexity of even a relatively short manuscript, such as *Xinian*, cautions against the “one size fits all” approach toward the texts' reliability. Every textual segment should be treated separately;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should be avoided; and the preferred approach toward transmitted and recently discovered texts should be “respect but suspect.”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rality; reliability; *Xinian*; *Zuozhuan*